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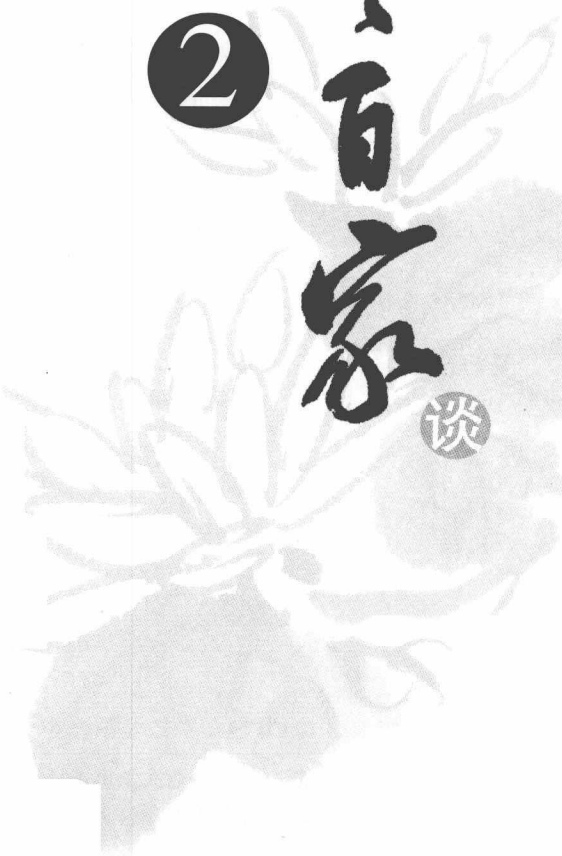
2010年第2辑总第13辑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Wenyibaijia

文藝百家^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文苑百家



谈

WENYIBAIJIA

[2010年第2辑总第13辑]

2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百家谈/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50-0320-2

I. ①文… II. ①安… III. ①文艺—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I2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6989 号

文艺百家谈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印 张	11.75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278 千字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320-2

定价:17.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文艺创新发展论坛

- (1) 长篇小说的传统、现状和创新 雷 达
(8) 文艺创作的创新精神 唐先田
(13) 小说必须面对的几个问题 许春樵

文艺观察

- (20) 呼唤“第三种批评” 黄书泉
(26) 文艺精品的定义标准与实现 沙 鸥

作家作品论

- (31) 暧昧时代的灵魂拷问——季宇小说论 黄佳能
(43) 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长篇小说《农民工》阅读札记 毕新伟
(52) 小说《柳如是传》的创作特色
——兼论石楠传记小说对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贡献 乔延凤
(60) 田间诗歌的艺术价值 娄彦刚
(65) 安徽女诗人两题 沈天鸿
(72) 还原历史记忆 追问文化精神
——读完颜海瑞散文集《江山空锁》 张赛赛
(75) 从人文纪实到心灵符号——康诗纬的摄影艺术 齐太平
(81) 山水之魂——议洪凌的山水油画 周发艾
(84) 为“中国化”文论体系建设抛“砖”引“玉”
——评吴家荣《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 孙仁歌
(90) 当年红学小人物——白盾 汪大白
(94) 论韩国电视剧《魔女幼熙》中马幼熙形象的塑造 陈晓农 农庄女

专题评论

- (100) 人性光辉的颂歌——长篇小说《风尘误》读后 唐先田
(104) 灵与肉的磨难和冲突——读《风尘误》有感 赵 凯 徐 浩
(107) 误入风尘 不掩美玉——小议《风尘误》中严蕊的性格特征 柳婷婷

理论研究

- (110) 中西美学对照下的味觉审美感官地位 施 咏
(115) 论精英与民众的不同反抗模式兼及一个文学难题 高 韩
(121) 语言之思——从顾彬的批评谈起 徐庆年

序与跋

- (126) 梅花二弄声入云——写在黄新德《萍踪浪迹几度秋》出版之际 唐 跃
(128) 乡恋——小城故事多——序《徐瑛文集》 苏 中
(132) 说不完的安徽戏剧——《安徽戏剧通史》序 王长安

文艺记忆

- (138) 追忆京剧《丹凤岭》的遭遇片段 柏龙驹

艺苑纵横

- (141) 近现代江淮书风的文化品格 陈 智
(152) 一段唱腔的变形演绎所引发的思考 周 慧
(157) 寻找编剧——关于编剧养成的一点思考 王庐璐
(160) 感受传承与发展 领悟幽雅与和谐
——安徽省第十七届摄影艺术展获奖作品述评 赵 昊
(165) 歌影双栖 桃李芬芳
——纪念皖籍表演艺术家黎莉莉诞辰 95 周年暨逝世 5 周年 黄敏学
(171) 谈“黄梅大鼓”新曲种的形成与发展 江 皓
(174) 泛商业时代背景下中国动画文化发展思路 张 鹤 杨 梅
(178) 略论丫鬟命运的三部曲 牛海玉

正文版式 快 然

尾 花 晓 莺

长篇小说的传统、现状和创新^{*}

●雷 达

近十年来，长篇小说在我们的阅读生活、文化生活等精神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一些著名的中外长篇小说是大家经常阅读的，由它们改编的影视作品也非常流行。实际上，很多长篇小说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可以说，一方面艺术来源于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也模仿艺术，长篇小说对我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长篇小说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第一文体，成为市场化的一个宠儿。中国当代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长篇小说上。在世界范围内，长篇小说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水平的主要标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往往都是重要的长篇小说作者，如去年的赫塔·米勒（2009），今年的略萨，以前的维·苏·奈保尔，奥尔罕·帕穆克等。

中西方对于长篇小说的观念不同，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到有很好的文章去论述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中国的四大或者五大长篇小说，是古典长篇小说。然而这些作品往往不被西方承认，认为它们不是长篇小说，或者说是成熟的长篇小说。我当然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觉得我们古代的长篇小说有着伟大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非常了不起。我们的确和西方不一样，有一个讲史的传统，文史不分家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从《史记》开始就有文学的笔法。我们还有说话或者说书传统，不管是口传故事还是说书的底本，它们都有可能演变成长篇小说。

中国的长篇小说一般认为出现在元末明初，明代初期是我们长篇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些小说确实和以前的历史传说、历史事实有很大关系，经过作家加工，成为非常伟大的作品，形成了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和英雄传奇（如《水浒传》）两大传统。《西游记》还开启了我国神魔故事的传统。到了《金瓶梅》，中国小说开始其市井传统，脱开历史的路子，写了很多家长里短的事，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红楼梦》学习并超越了《金瓶梅》，是伟大

^{*} 该文系雷达2010年12月11日在“安徽省文艺创作创优学术交流研讨会暨第二届安徽省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的讲座摘要，未经本人审看。讲座文字记录由朱威、韦魏根据录音整理。

的现实主义杰作，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超过。所以，当我看到西方一些人对我们的长篇小说传统不以为然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无知。

中国长篇小说很多都是章回体，反映出中国人特有的时空观念，比较注重故事的节奏。而西方小说则不管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现代主义作品，都比较注重研究个体内心的流程，包括意识的流程，重视个人的经验和想象虚构的能力，这些观念与我们不同。俄罗斯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评价长篇小说时写过一句话：资本主义文化创作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文体就是长篇小说，它将是市场的宠儿。巴赫金真了不起，他说对了。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是西化的长篇小说观念，成熟得比较晚，一般认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是茅盾先生的《子夜》。此后长篇小说逐渐成形与发展，如巴金的《家》、《春》、《秋》，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往后可能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再往后是钱钟书的《围城》和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它们形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一些传统。

我们现在面对中国和西方两大类源流，西方的源流同样是我们的精神资源。我受西方现实主义的影响非常深，一直认为最好的、最了不起的作品可能还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比如《悲惨世界》。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确切地说，他是现实主义的底色，加上浪漫主义的情节。像《九三年》这样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作品，是说在一切之上还有更高的人性和爱。我觉得现在的文学作品缺少爱，缺少大爱，现在的人也缺少这种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写的不仅仅是音乐家，而是一个人的精神追求，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还有对我震撼比较大的俄罗斯文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们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现在看的人不多，我感到很遗憾，我们还是要回到古典、回到传统，不认真读这些作品，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有些人觉得西方的这些东西没什么了不起，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世界文学里有很多珍宝，有很多伟大的传统没有被我们发现，没有被我们好好利用。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很多作家都缺乏底蕴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没读过这样的作品。比如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写的是一个家族的自我消亡，这既是家族百年孤独的历史，也是惨痛的拉丁美洲的历史。它不是写一个故事，而是写内在的、深刻的东西。现在中国有很多小说家把自己迷失在写故事的趣味性中，以为能讲好故事的作家就是好作家，其实差得很远。真正优秀的作家是能把故事的趣味推向存在，这样的作家才是深刻的作家。《百年孤独》那样的家族叙事就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正是最需要精神的时代，是需要文学的纯粹理想精神来感化和陶冶人的时代。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的本性都迷失了。但是我们现在写东西就追求好看，编成电视剧，博得别人一笑就自以为精彩，以至于把我们全民的审美水平都降下来了。那么多描写官场、欲望等表面的东西，只写出人的本能，很外在。还有一些表现惨烈的小说，写的也是外在的惨烈，不是内在灵魂的惨烈和痛苦。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很多较优秀的作家也只是达到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习中西小说优秀的创作传统，包括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创作，不要轻易瞧不起。要好好去读一读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包括美国文学的作品。

下面我们来说说中国长篇小说的现状。我想把这个时间推得远一点，讲讲中国当

代文学史上的长篇小说创作，这样我们的视野会开阔一点。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多年的历史中，长篇小说一共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1956年到1964年前后出现了一批比较好的长篇小说，如《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小城春秋》、《山乡巨变》、《艳阳天》等。我个人认为这些作品包含了作家的深刻体验，反映出厚重的生活积累，有的还是作家长期酝酿的作品，虽然作品中的很多东西让位于政治，但作品中的许多故事、人物在作者心中活了很多年，比如《红旗谱》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长期积累的，不像现在的很多人几个月就写出一部长篇作品来。今天我们不提阶级斗争，不一定是说历史上就不存在阶级斗争，我有这个看法，我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现在我们虽然不提马克思的这句话，“迄今为止，人类一切斗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它曾经存在过，而且还很激烈。当一个人人活不下去的时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旧中国阶级压迫是存在的，因而以前的很多作品都是阶级叙事。我们不要彻底否定阶级压迫，那时的文学作品虽然一度被悬置起来，但仍然有存在的价值和研究的必要。比如《红旗谱》里关于民族化的描写，追求语言的民族气魄等。《创业史》中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写得真是了不起，作者柳青是路遥的文学教父，没有柳青就没有路遥，就没有《平凡的世界》。另外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浩然，他写的《艳阳天》同样是生活的血肉和“左”的观念扭合在一块，那些来自农村的很有泥土生活气息、生动鲜活的群众性语言，现在的很多作品没有。

第二次高潮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启蒙主义的时期，是吸收各国社科新经验的时期。现在很多人都怀念那个充满自信的年代。80年代也出现了一批很好的长篇小说，如《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沉重的翅膀》、《李自成》。还有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在二十年后仍然热销，除了作品有励志的因素外，还有它的底层叙事（虽然那时没有“底层叙事”这个词语），我相信今天的打工仔看到《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少平在黄原揽工到处碰壁的经历时，肯定会引起共鸣。除了路遥，那时陕西出了好几个作家，如陈忠实、贾平凹，他们都是农家子弟出身，和农村的血缘关系很深，写农民倾注了很深的感情，同时创造了文学的奇迹：《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发行上百万册，贾平凹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学历都不高，但他们的局限恰恰就在于他们的学历低，缺乏现代批判意识，不能站在一定高度甚至是启蒙的立场上去关注农民，甚至批判农民，跟五四时期以来的一些大家相比差远了，比如鲁迅、胡适、林语堂这样的人物，再比如钱钟书，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我们现在作家的知识体系都是不系统的，缺乏基本的根基。

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后）长篇小说出现了第三次高潮。为什么是1993年以后，很值得研究，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了，邓小平的南行讲话大力肯定市场经济，那时深圳模式出来了，大众的文化趣味也来了，文学的教化功能受到很大的抑制，其娱乐消遣功能却扩大了。那时出现了书商，出现了市场化的出版业，这些对长篇小说创作都有影响。《曾国藩》、《白鹿原》、《废都》同时出现在1993年，有趣吧？在那个突然解禁的年代，涌现了一大批长篇小说，虽然经过时间的淘洗能留下来的不多，但那时出现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却一直持续到今天，从开始的300

部到以后的500部、800部再到现在的几千部。我这么讲并不是一味歌颂，其实现在很多长篇小说实际上是垃圾，泡沫化的东西，但我们还得肯定文学是在发展的，还是出现了重要的文本。比如《白鹿原》就是我们本民族宏大叙事的一部力作。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突破和扬弃了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完成了一次很大的跳跃，一次上了好几个台阶，基本超越了党派视角转化为一种文化视角，将政治、军事冲突、经济斗争转化为礼教和人性、灵和肉的冲突，同时还吸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这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的姿态，不是过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姿态。至于当时非常流行的《废都》，我认为它是借助性这个通道，来表达一代知识分子特别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主人公庄之蝶有点像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有找不到自我的困境，极度苦闷，情绪颓废，很能代表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那种空前的焦虑心态。还有《秦腔》里面有两个大的象征，一个是土地被解体，一个是“秦腔”的衰落，反映出作家的大胆笔墨，虽然作品不太好读，但贾平凹还比较了解今天的农村，而我们今天的很多作者不了解今天的农村，陷入极大的困境自己还不知道，还在编那些根本不真实的农村故事。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文本，如余华的《活着》，那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谈《活着》，谈余华的转型。湖北作家刘醒龙《圣天门口》也是90年代很重要的长篇，它是“大历史”套“小历史”，企图写出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总体来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其主要表现在：第一，作品对于人的认识的变化，对于人性发掘的变化，对于人的发现的变化。比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就有对于人的新发现，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新的发现。再比如王蒙先生《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既向往西方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捆绑，也是对于人的一种发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发现了余占鳌这么一个草莽英雄。还有铁凝《玫瑰门》对于女性的重新发现，王安忆《长恨歌》对于上海这个大都市秘密的探索，都比较到位，值得肯定。第二是作品对历史的大面积开掘，我们从90年代以来（其实80年代就开始了），出现了重塑历史的狂欢化场景。二月河写了《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强调文学性不太注重历史，读起来很带劲。唐浩明注重历史考证，写名臣、重臣，像曾国藩、张之洞、杨度，写得都很不错。还有凌力的《少年天子》。姚雪垠的《李自成》是阶级叙事，写得很好，尤其是第一卷，我很佩服。关于重塑历史，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在于你叙述哪个年代，而在于你在哪个年代叙述。就是说，我们今天历史叙述的主体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写阶级斗争，写农民战争，写那种重复的历史观，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写圣君贤相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历史。第三，塑造了一批典型或者接近典型的人物。现在有不少人认为长篇小说塑造典型人物是一种过时的理论，我不同意。一篇真正的长篇小说要想在时间的河流中立得住，主要人物或者重要人物站不住脚是不可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的刻画，不管是性格刻画、心理刻画还是情景刻画，都需要用心去做。

接下来我们谈长篇小说的创新。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叫《当下阅读和写作中的分化与重组》（《新华文摘》转载了这篇文章），认为现在出现了专业阅读、大众阅读和网络阅读分化的现象。专业阅读是一种主要受文学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关注和喜爱的阅读，大众阅读是一种靠近大众化的通俗阅读，它们与网络阅读井水不犯河水。网络

阅读的很多人喜欢看类型化的东西，包括穿越、玄幻、盗墓（《盗墓笔记》、《盗墓王》等）；大众文化注重官场、职场；纯文学主要是传统文学、大众刊物，包括一些文学图书。传统文学有老龄化、圈子化的倾向，圈子很小，有点萎缩，但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还是文学大国，文学活动很多，出版物也很兴盛，从事文学或者爱好文学的队伍很庞大。尽管现在多媒体、影视等对它挤压得很厉害，文学比较边缘化，但再边缘我们也还可以。

我们现在不能老是沉迷于80年代，觉得那个时候多好，全国人都在读一篇小说，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很大。可是现在不行了，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基本上不去。现在是一个“泛文化”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80年代算是一个文学时代。在“泛文化”时代，书店里多是时政、理财类的书，然后就是算卦、风水、传奇、股票这些东西繁荣。说起文学现在最热销的是时政也叫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尽管不断遭人批评，从最早鲁迅先生批判的谴责小说、黑幕小说到今天，我们对官场文学的评价算是比较低的，可是现在我们很多出版社都靠官场小说来维持，十几年来长盛不衰。像什么《驻京办主任》啊，《白道》啊，官太太啊，一把手啊，组织部长啊，首长司机啊，双规啊，等等。再就是职场，比如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2007年出版的六六的《蜗居》。另外一种是新历史，有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儿》，发行量500多万册，既不是严谨的历史叙述（如吴晗的《朱元璋传》），也不是大历史书（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它是把历史人物放在现在，以现代人的眼光来揣测历史人物的心态，同时加以调侃，从而发掘历史的弊病，把历史作戏剧化的处理。人家一看，这好玩啊，消遣。官场、职场、情场、青春、校园、动物、新史话，这类书现在最流行。

现在有一个最根本的审美上的变化，那就是人们不太喜欢悲剧，而是喜欢轻喜剧，喜欢调侃，喜欢那种缓解现代人竞争压力的轻松的段子。现在要拿一些沉重的悲剧让人去看，人家都不愿意看。大家喜欢看赵本山、小沈阳。我曾经说过，小沈阳是允许存在的，但要是让小沈阳引导中国的审美潮流是可悲的。你不过是逗人一乐而已嘛，谈不上有什么思想艺术的含量。如果人们只剩下笑也就很可悲了！人在世俗化的时代是追求感官享受的，怀疑永恒，淡薄贞操，诚信缺失。现在就是这个时代，而在这种时代里，我觉得恰恰最需要文学。

还有官场也成为大家取笑的一个主要对象，比如今年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我认为最大的冷门，应该是广东打工仔出身的王十月创作的《国家订单》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可是这完全都被“羊羔体风波”掩盖了，究其原因还是“羊羔体”作者的官员身份。现在网络上的“李刚门”啊、“王鹏事件”啊，针对的就是官员。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官场小说的困境》。我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官场小说？我认为中国有非常深厚的“官本位”思想。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是既恨官又羡官，还希望自己能当官。官场是社会的一个关键部位，我们既了解官场又不了解官场，有窥探的欲望，想知道官场里的潜规则到底是什么，想把这神秘的幕布拉开。人们愿意在轻松、消遣的阅读过程中把官场当做审美或审丑的对象。但是官场小说不能写得都差不多，要有提高，要深刻开掘这种现象。比如前几年有一本书叫做《沧浪之水》，写的就是精神的腐败。文学应当是精神领域内的感慨。

最后我们来谈长篇小说创作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长篇小说有空洞化、表面化、表象化的危机。没有结结实实的人物，没有精彩的细节，有些东西很表面，没有进入人物灵魂和心理，最根本的原因是作家的体验不够，不懂今天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作品缺乏现实感。所谓“现实感”并不是说我们要把时间仅仅限制在现实当下，写当下和历史都可能很有现实感，令我们看了有所感悟，受益匪浅。作家必须研究中国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在全球化、高科技化、都市化、网络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个社会变化太快，我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从自行车时代进入了小汽车时代，现在又将进入高铁时代，人和人之间的移动非常快。这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物理距离最小的时代，同时又是人和人心理距离最大的时代。时空的变化影响着我们的心理、道德感和对世界的看法。现在的人都急得很，什么都要快。而今年鲁奖的获奖作品《最慢的是活着》，就是说节奏应该慢，精神生活有所增长，体验是慢的。独特的视角令作品成功获奖。在今天，我们的作家有多少是对这个时代有所体验呢，我觉得很少。过去“深入生活”的口号被固定化了，一律深入下去，不顾作家的个性，有过惨痛教训，但作家还是要体验生活的，否则根本写不好作品。现在我们有太多作者不了解自己陷入的困境，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敏感，还在编写80年代的老故事。

第二个问题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的缺失。这并不是要求作者对所有作品都全身心投入，但伟大的作品是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是一种生命写作。现在不能要求作家一辈子只写一本书，但有的人写得过快，还没有怀胎十月就分娩了，一年就写三四部小说，质量没法保证。书籍市场要求快，文学写作要求慢、精益求精，这就发生冲突了，现在没法解决，作家为了不被人们遗忘、为了保持自己的文学地位、为了收入而拼命写作，甚至于掏空自己去写，没有时间生活。有很多作家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创作质量下降，甚至出现休克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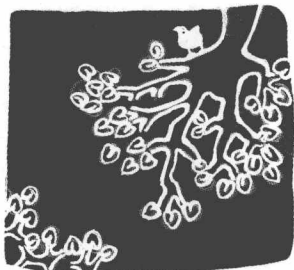
再一个就是复制性和原创性的问题，原创的东西比较少。我们进入了电脑网络的时代，拼贴、克隆、复制都很容易，这对我们写作的原创力有一定威胁。现在确实不是传统的写作时代了，是一个幻化的写作时代，基本上人人都是作家，人人都是读者，复制现象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写作以及文学的品质。比如《藏獒》出来了，马上就有一大堆写狗的；《狼图腾》出来后都是写狼的；《上海宝贝》出来后，又出了多少宝贝啊？还有官场小说，也多是互相模仿。我们要提倡原创性，要越过生活表象中那种雷同，进入个性化的写作。文学只有个性化才会有前途，有看头。

还有文学的诗性和超越性问题，对于今天中国文学的写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一个写实的传统，往往只会写实，缺乏去重构这个世界的想象。小说表现的是现实之上的另一个现实，是用现实的材料去构筑的一个心灵的现实。而我们现在的创作与生活贴得太近，离开真人真事、离开原型就不会写了。现在我们很多作家基本上可以编一个好故事，但再多的东西就没有了，这一点要超越。比如说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写了一个人物，却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很多弱点，连知识分子都发现自己身上有阿Q精神。这就是一个超越，超越具体的时空和表层的意义，上升为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去年有一部书我觉得有一定的超越性，就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写了中国农民

和中国乡土的那种“百年孤独感”，就是一个人要找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很难，总是有一种中国式的孤独感，作品不再重复我们过去乡土写作的几个模式，不再重复那些老主题。与加缪《鼠疫》的超越性、《百年孤独》的象征性相比较，我们长篇小说的超越性、象征性还很不够。

再一个就是作家要扩大自己的精神资源。我觉得我们整个作家缺乏思想，其实我们的思想资源很丰富，外来思想资源，传统思想资源，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思想资源，都有很多优秀的内容，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学习和消化吸收，我们还显得比较浅薄。现在我们就只记住一些生命的本能，一个食，一个色，也就是说对于人性的理解还不是很开阔。长篇小说首先要看作品的社会内涵，第二要看作品人性的深度，第三要看文本的创新能力，包括汉语言的叙述能力有没有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有没有提高。所以我觉得作家精神资源的扩大是必要而且广泛的。我们应该多读中外古今的作品。

现在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表象化、空洞化、复制化、原创力匮乏、思想精神资源匮乏、超越性不够、生命的投入不够等问题，能够和世界对话的长篇小说比较少，和西方的距离还比较大。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自我，认识自我的短缺，从创新入手，努力在浮躁的时代克服这种浮躁，文学创作才会上去。对于整个文学，我还是抱着很大信心的。



文艺创作的创新精神

●唐先田

人类历史是一部不断创新不断走向文明的历史，没有创新，只能永远处于蒙昧时代。古籍《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籍《周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生之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谓日新其德，便是日创其新。中国的古典哲学家们对于创新十分赞美，极力倡导。由于对创新觉悟得很早，人类创新在各个领域各种学科取得了数不清的耀人眼目的成果。文艺创作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没有文艺创作的创新精神，就没有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博大。大家都懂得文艺创新精神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那么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去理解和实践文艺创作的创新精神呢？根据我个人的领悟，觉得以下三个方面最为重要。

一是题材要新。我们常说要抓重大题材，也就是新题材，别人没有碰过的题材你抓住了，就会出好作品、大作品，一炮打响。所谓新题材，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预示着未来发展广阔前景的新生事物，被你敏感地捕捉到了，进入了你的构思形诸于你的笔端，或小说或诗歌或散文或其他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让读者眼前一亮，这样的作品一定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回顾一下文学史，哪一部传世之作不是如此呢？小题材，一般的题材，虽然也能挖掘出深刻的意义，但大题材、新题材毕竟有它的优势。当然题材不能绝对决定创作的成败，然而抓大题材、新题材的确意义重大。这又提出一个问题，发现不了新题材大题材，怎么办呢？美学家说，美是客观存在，而且到处都有美，问题在于发现，我想这是真理。社会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生活之树常青，需要作家文艺家去发现。发现生活中的美是一个过程，也可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用行话来讲，就是要深入生活。生活中有很多珍珠，这些珍珠散落在乡村在田野在矿山在学校在各个科研单位，在劳动者的汗水里智慧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许蒙上了一层泥土一层灰尘，还没有被人们所识别出来，作家就是要识别的功夫，并精心给予擦拭打磨，让这些珍珠显现出本质的容颜，焕发出炫人的光彩。这里我举我省两位老作家的创作来作一说明。一位是鲁彦周和他的《天云山传奇》，新时期的经典名篇，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79年7月的《清明》创刊号，那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对“文革”中受迫害的无辜者进行平反昭雪，然而彦周先生所写的平反冤假错案

并非“文革”中所发生，而是要追溯到更早的也就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误戴上右派帽子的同志。没有红头文件，没有政策依据，但作家从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中敏锐地看到了反右运动中也有很多冤假错案，写出了《天云山传奇》，塑造了罗群、冯晴岚等鲜明人物形象。小说发表后特别是电影放映后，引起很大争议，当时的《文艺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批判的一方，就是以没有红头文件为依据，说这部作品歪曲了党的领导形象，给予全盘否定，当然支持真理正义支持这部作品的人更多。鲁彦周先生为什么敢冒风险，有那么大的思想勇气和艺术勇气呢？我想主要是丰富深刻的生活积累和生活经验，给予了他捕捉重大题材新颖题材的创作敏感和创作动力，他曾对我说过，罗群、冯晴岚都是有生活原型的，他非常了解他们并深深尊敬他们同情他们，他之所以熟悉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人生遭遇，是因为他在深入生活方面下过很大决心作过很大努力，他曾举家迁往岳西县一个山区，担任公社副书记，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岳西山区为背景的。另一位是江流和他的《春回皖东》，这部报告文学是最早描写和歌颂农业大包干的，发表于1980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那时候对于农村承包责任制争议很大，江流先生正是因为深入到皖东地区进行深入的走访调查，敏感地看到了承包前后农业生产和农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才以无比的热情写出了这篇报告文学的。事实证明，江流先生所热情赞美的农村大包干，是中国新时期改革的先行，像春雷一样迎来了整个中华大地的改革开放。如果江流先生没有到皖东地区去实地考察走访，是无法抓住这个大题材新题材，也无法写出《春回皖东》的。老一辈作家的文艺追求，应当成为我们的风范。须知深入生活，是身心都要深入下去，时下流行的采风，只是走马观花，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应有坚定地深入生活的自觉。说到题材创新，有一个问题我想强调一下，那便是政治题材。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本质是必须服从文艺的自身规律，是正本清源，但并不是说文艺是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为什么？因为生活不可能脱离政治。一些作家、艺术家作过不参与政治、要远离政治的表白，其实这是做不到的，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它常常对经济、文化起支配作用，因而政治是文艺创作的很重要题材。政治题材也写出许多经典作品，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是一例，这首诗是杜甫的名篇，杜诗中很少有充溢着如此热情欢快的篇章，被称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浦起龙《读杜心解》）。这首诗写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其时杜甫流寓梓州即今四川三台，头年冬天即宝应元年（762）冬天，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河南的郑州、汴州（即今开封），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也就是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山等相继投降。洛阳的朋友将刊载这些消息的邸报由京师辗转传送给远在四川的杜甫，杜甫得到这些消息后，情绪激动，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名作。朝廷的官军打败了叛军，保卫了唐王朝的政权，官兵在战争中胜利了。战争是政治的集中反映，杜甫从政治题材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和谐安宁无比向往的心情。当然写政治题材绝不是图解政策，更不是曾经提倡过的“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而是要从政治中寻找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30多年来，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农村大包干、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以人为

本、建设和谐社会等等，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利国利民的政治大事，都是大题材、新题材，引起了作家们的广泛关注，在不久的将来，是一定会产生大作品的。每个作家都想抓新题材大题材，但并不是每个人的运气都那么好都能抓到，如果说新题材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一旦抓住了就预示着作品成功了一大半，那么老题材就好比一片熟地，必须深挖，精耕细作才能出好庄稼，我想以唐宋两位诗人的创作对比来作一说明。唐代的崔护写过一首《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纯情的爱情诗。宋代的欧阳修对这首诗自然非常熟悉，几百年之后，他还是写了一首词《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除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两句外，其他几句与崔诗格式几乎一样，还不如崔诗含蓄委婉。欧阳修是大家，他不可能掂量不出来，但他确信“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两句是爱情题材的新发掘，果然这两句至今传诵不衰，甚至超出了崔诗。我省著名作家季宇先生的长篇新作《新安家族》也是个例子，《新安家族》是写徽商的，徽商题材是个老题材，已有很多作家写过，季宇本人也写过，但他总觉得不满意，于是进行深刻的思考、深入的挖掘，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写出了高出一格的《新安家族》，以程天送为代表的徽商人物，有阳刚之气，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摆脱了官商勾结的局限，作品鲜明提出的“公平商权”，是一大亮点，和西方商界的霸道行为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很长志气，和描写晋商的《乔家大院》比，也有新意。《新安家族》是徽商题材的艳丽新花，为文艺皖军增添了亮丽的光彩。在题材问题上，要善于发现新题材，要努力挖掘老题材，但绝不能模仿，《潜伏》、《闯关东》、《金婚》出来之后，一大群模仿秀跟着出来了，这是平庸的表现，还有重拍《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那是逃避创新，是糟蹋经典，是一种洗钱的低俗表现。

二是思想要新。所谓思想要新，就是作家的创作理念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要有导向性。作品要有思想，作家要成为思想家。2001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听朱镕基总理的报告，一次听温家宝总理的报告，两位总理都讲到文艺作品对他们人生道路的重要影响，使他们坚定革命向前，朱镕基总理讲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温家宝总理讲到的文艺作品则更多。讲的都是文学作品对读者的思想影响。现在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度有多大，我没有作过调查，不能妄说，但我们青少年时代上学的时候，上个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文艺作品的影响力的确很大。大约1965年，我父亲进县城，看到新华书店门口不少人排队买一本书，因为我那时刚到合肥上大学，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很关心地问书店卖什么书，回答说是《欧阳海之歌》，他立即买了一本寄给我，这使我很感动。当时的《红日》、《红岩》、《红旗谱》，谓之“三红”，也盛极一时，这些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作品，今天应当如何解读，学术界有很多说法，但它们当年所起的作用，却是历史的存在，影响过一代人。这些作品之所以有吸引力，主要是人物生动，感染了读者，归根到底，是书中人物的思想风采、精神风貌，对读者有震撼力。文学经典所体现的思想意义都是崭新的、出人意表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等，都是如此。就说《西游记》吧，文学史称为神魔小说，题材本身就非常新颖，

但思想的新颖更突出，孙猴子敢于大闹天宫，敢于造玉帝的反，敢于让龙王俯首帖耳，敢于和天上的各路神仙称兄道弟、调谑嬉笑，这是石破天惊的了不起的事，《西游记》是永恒的经典。再说《红楼梦》，将大观园的青年男女写得那样细腻，那样各具情态，还揭示出了那么多的人间真理，“才将纱帽戴，又把枷锁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还有那护官符，难道写的只是曹雪芹生活的那个年代吗？它的思想意义超前很多，读过后很自然联想到当代，这种锐利准确的远见卓识，不能不让人为之惊叹。还有《水浒传》，常说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此，前不久周汝昌老先生发表了新的见解，他说那时没有皇帝，徽钦二帝都当了俘虏了，还反什么呢，皇帝是一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无皇帝可反了，再反就是要反自己，民族尊严在哪里，国家尊严在哪里？读《水浒传》多少年都没有怎么读懂，周老先生别具慧眼，看到了《水浒传》的这层思想意义，值得钦佩。如何能使自己的创作有新的思想？这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在座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体会，我的体会是，首先要学习，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文学艺术当然是文化，这个论述很精辟，要好好领会。要学习古今中外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过程中所积累的精神财富，并从中寻找人类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开拓自己的心胸，开拓自己的眼界，从而使自己在创作中较好地把握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充电，才会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文艺创作也便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其次，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大量地阅读，因为从事文艺创作，阅读的重点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看看大师们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如何写的，他的人物是如何塑造的，他如何结构故事和调动情节的，他们的立意有什么高明之处，他们的语言风格哪些地方值得借鉴，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他们还有什么局限，如果在这些方面有了自己的心得并能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体现，必然会前进一大步。其三，勤于实践，就是不断地写。中国作家协会前不久向作家们发出号召，要克服一个懒字，从正面讲，那就是要勤于实践，这里所讲的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深入生活，一是勤奋写作，在深入生活中不断地积累，使自己的思想库、材料库、人物库、语言库有更多的储存，随取随用，没有枯竭之时，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地提炼，使意境更高雅，思想更前卫。其四，要敢于否定自己。在学习、阅读、实践的过程中，要直面自己所存在的不足，不要老是文章是自己的好，也不要急于发表，初稿写好了，请同行、朋友看一看，请作协、研究室在一定的范围内开个座谈会，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择善而从之，进行修改完善，我想肯定是有帮助的，肯定会使自己的作品上一个台阶或两个台阶。我们都知道，盛极一时的先锋派作家，曾经作了一次否定自己的调整，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由难懂走向好看。先锋派作品的共同特点是语言优美新颖，其他则天马行空，让人摸不得头脑，用陈晓明评论潘军作品的话来说，就是潘军的小说（指先锋作品）是一个大陷阱，它让你非读下去不可，读后又一无所获。读者看不懂，只能是先锋作家们自我欣赏，他们感到这样不行，于是大胆否定自己，写人物、写情节、写故事，要好看，这里所说的好看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明白通俗易懂，不再过于扑朔迷离，第二是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先锋作家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三是方法要新。所谓方法要新，也就是艺术手法要新。千百年来，无数前辈作家

在这方面作过许多艰苦的探索，为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概言之，就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朦胧、魔幻、黑色幽默、现代派等等，都由这种方法派生出来，这些方法，中国的老祖宗们都使用过，而且成就非凡，比如庄子、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等等，这是令我们引为骄傲的。方法的创新、艺术手法的创新，主要靠作家的领悟，千能万巧，在乎一心，没有任何教科书可以提供帮助。我所要表述的一点是，文艺创作的艺术手法的创新，方法的创新，需要有才气、灵气，要有这方面的天分，这不是天才论，而是文艺创作中的数不清的事实。熟能生巧，指的是匠，天才出于勤奋，鼓励勤奋毫无疑问没有错，天才也需要勤奋，但勤奋与天才却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两个领域。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方法创新需要灵气，《三国演义》里的望梅止渴的故事，陈寿的《三国志》里是找不到的，历史也没有关于曹操这方面的记载，完全是罗贯中的天才创造。望梅止渴早已成为一个成语，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现在读到小说的这回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震撼，那是因为我们对它太熟悉，试想，《三国演义》刚面世时，还没有望梅止渴这个成语时，读者读到这里会是何等的兴奋激动，不得不钦佩罗贯中的天才艺术劳动。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孔夫子，《论语》总共两万字左右，直接或间接成为成语至今经常使用的，就有六七十条，这是智慧的奇迹，是孔夫子天才的表现，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小说，但《论语》里也有小说的因素，有人物有情节有对话，那便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先进第十一》）那一篇。《孟子》里的《齐人有一妻一妾》更是一篇很完整的小小说。黄梅戏《天仙配》也是天才之作，充满着灵气，《路遇》一折里有一句七仙女的唱词“我本住在蓬莱村”，那可不是随便的一句话，而是剧作家天才灵气的表现，七仙女为了掩饰她的身份，变成了村姑，家住哪里呢，有很多村庄的名字可供挑选，唯独蓬莱村最精准最确切，蓬莱本是神仙住的地方，将它说成是个村，何等巧妙。当年严凤英在演唱这一句唱词的时候，也是非常有灵气的，她在表演体会里说，在唱“我本住在”四字时，节奏较缓慢，眼珠在转动，表示在思考，蓬莱是她本来就熟悉的仙家之所，加上一个“村”字就变成凡间的乡村了，“蓬莱村”唱得节奏欢快，表示她对这天真美丽的谎言很得意，唱完之后又回头暗自一笑、不好意思，表示得意中的歉意，她毕竟是对董永撒了谎的呀，在一句唱词中，传递出这多么复杂的人物内心变化，严凤英表演得尽善尽美，她没有上什么学，但的确有灵气有才华，不愧为艺术表演大家。还有一个例子是潘军的《重瞳》，这是写项羽的一个中篇，历史小说全新的一种范式，其中写到项羽与虞姬第一次见面的情节，他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你刚才不是喊了声虞吗？我就叫虞。”潘军的想象真是太丰富太优美太有才气了，将项羽的吆喝乌骓马的大呼一声“吁”，借助这个“吁”的谐音，与眼前这个年轻美貌的“虞”联系起来，表达了相互之间的爱慕一见如故，又如此浑然一体，堪称神来之笔。青年作家闫红也是很有才气的，她写的文章很吸引人，常常妙语连珠、引人入胜。

文艺创作的创新精神，题材创新、思想创新、方法创新，只是概而言之，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创新，如语言创新等等，各方面的创新组成一个系统的创新工程，其目的就是要塑造新的人物，创造新的意境，写出新的世界，写出好作品、大作品。